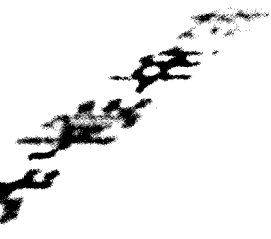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

主编 林在勇

刘佛年著 金一鸣 整理

刘佛年学述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

丛书策划:周游工作室

责任编辑:周向潮 何梦祥(特约)

封面设计:信天翁工作室

责任校对:张谷年

刘佛年学述

刘佛年著 金一鸣整理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杭州天天电脑信息处理有限公司 (杭州武林路 125 号)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 (杭州环城北路 41 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6.2 万
插 页	2
印 数	1—3000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1671-7/G·464
定 价	12.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MULU

刘佛年 学述

前 言	1
自 叙	3
求 学	3
解放前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0
解放后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7
学 述	52
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教育问题 的尝试	52
“教育大革命”时期的思考	80
主编教育学教材	100
对几个教育理论问题的看法	146
主编《回顾与探索——论若干 教育理论问题》	175
主编《中国教育的未来》	213
附 录	245
年 表	247
著述目录	252
后 记	259

前言

介绍自己，而且要比准确地介绍自己，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我一直不愿做这种事。

两年前，浙江人民出版社计划出一套“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请一些学者自述其理论建树，为新一代学人提供有益的专业借鉴。他们来约我写学述，谈谈在教育研究方面的情况、问题，以及个人的体会。他们的好意我是心领的，但不敢从命。一是不敢担这教育学名家之名，尽管几十年来我同教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自己也曾尽过心和力，但要说什么理论建树恐怕还说不上。二是要写半个世纪的学术思想发展并非易事，深感力不从心。所以，虽有多次稿约，均未答应。

今年3月，出版社又重提旧事，使我重新考虑这件事。我的志趣原在哲学方面，兼及教育。在解放前夕及建国初期曾写过一些教育方面的文章。专门从事教育理论研究是逼出来的。1961年，中央决定编写文科教材，我被“点将”主编《教育学》。教育学是一门相对较为幼稚的科学，在我国更是这样，原有基础相当薄弱。受命之后，为了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教育学，组成了教育学编写组，依靠集体力量共

同研究、编写。我在其中起着组织者的作用。成果是集体的，在集体成果中包容着我个人的努力，而更多的则是一个群体的努力和智慧。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搞教育研究主要的还是走集体研究的路。许多同志参加了我所主持的课题研究，他们都是尽心尽力地贡献着个人的力量，共同完成了集体的课题。因而，我个人的学术经历实际上是我所处的学术群体的奋斗历程；写个人的学术历程实际上是为一个学术群体画像。何况，从我所处的这个学术群体的经历中大致可以窥测到一些我国教育科学发展的情况。写这份学述可能还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由于健康的原因，个人写作已有困难，不得已只能请金一鸣代笔。先写个人的学术历程，作为了解学术思想的背景；再分时期写各个阶段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观点。叙述力求真实、平直，如实地反映我平凡的学术生涯。

自叙

本书所要写的是学术经历和学术观点。学术经历是个人经历的一个组成部分。个人所处的时代、社会地位,以及经历又制约着学术观点的形成和发展。所以介绍学术经历还是从回顾个人的经历开始较好。

求学

我于 1914 年 4 月 1 日生于湖南醴陵小林桥一个地主家庭中。我没有见到祖父。他拥有每年可以收取租谷 200 余担的田地。我的父亲是他的四子,继承了每年可以收租谷 40 余担的田地。1922 年以后,他又买了一些田地,每年可收租谷 90 担左右。但家庭的主要收入是父亲的薪金。家境并不宽裕。

我的父亲刘约真,幼年应过科考,住过县里的淶江书院,后来进长沙的湖南优级师范,宣统元年毕业。毕业后,曾在中学里教过三年数学。在清末民初,他有旧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想,参加过同盟会和柳亚子等发起的进步文学团

体“南社”的活动。辛亥革命头一年，他曾到过江西和上海。回湖南后，与几位朋友一起办《长沙日报》，当记者，反对袁世凯。1913年，袁世凯派汤芑铭来长沙，《长沙日报》被封，并准备逮捕编辑和记者，父亲到乡下躲避。1916年，汤芑铭被逐出长沙，父亲才回到长沙，继续办《长沙日报》。1917年，又兼湖南财政厅编辑。1918年，北洋军阀张敬尧占据湖南，《长沙日报》被封，父亲再次逃到乡下。1919年，他到上海，与朋友一起办《天问周刊》，专事鼓吹驱张。1920年，张敬尧被赶出湖南，父亲才又回到长沙，任财政厅编辑，后改科员，1927年任秘书。1935年，他转到省民政厅任秘书。秘书是省政府的中级公务员，收入不菲，而且比较稳定。但好景不长，1936年，湖南省政府改组，父亲就解职归里。1942年，他在醴陵县主编县志，收入就不太稳定了。抗战胜利后，他又回到了长沙。解放后，他任湖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后来又改为文史馆馆员，按月领薪，直到1959年去世。

父亲是个文人，诗文俱佳，颇有学问。在政治上，他赞成反帝，有一定的反封建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对新中国的政策是拥护的。他为人拘谨、缺乏果断，但宅心忠厚、老实、笃于友谊，长期研究佛学，并擅长“国医”。我受父亲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我的父亲生子女七人。我排行第三，是家里的独子，自然受到较多的宠爱。我出生的那年，父亲正热心于研究佛学。在给我取名时，在排行的“年”字前面加了一个“佛”字，大概也是作为一种纪念。

我4岁时丧母，跟着大姐姐住在栗山乡下大伯父家里。6岁就在附近的国民小学里读书。读了两年，继母就带我到了醴陵县城。继母张贞祥是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在县立女学教书。我在她教书的学校里旁听过，后来进醴泉小学。高小是在长沙读的，五年级在修业小学，六年级在楚怡小学。

我读小学的时期正是全国反对帝国主义很激烈的时期，从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学校里进行反帝、雪耻的教育，讲反帝的史实，颂扬民族英雄，教唱爱国歌曲，鼓励学生发奋图强。这些在我幼稚的心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当时，我还随父亲学习《论语》、《孟子》和古文。同时，还看了些旧小说和侦探小说。

这里还得提一提楚怡小学的情况。楚怡小学是所很好的小学，有着革新的精神。它受当时美国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的影响，试行道尔顿制，片面强调学生的自学，放松了打好知识基础的工作。在这所小学里，我可以自由地学习，得到不少进步。年长以后，才感到在小学阶段未能把读、写、算的基本技能的基础打扎实，这与道尔顿制有关。这也使我对美国的进步教育持保留的态度，甚至加以批判。

1925年，我考入了设在长沙很有点名气的明德中学。这是一所旧制——四年制中学。我在这所学校一直读到毕业。在校的4年是我国政治风云突变的时期。1926年暑假，国民革命北伐军占领了长沙。我们都去参加欢迎北伐军的大会。以后集会游行很多，学生也参加街头宣传。学校里亦

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如语文教师教社会发展史，学生可以阅读进步书刊，如《向导》等。国民党员和共青团员都在学校中公开活动，学生自治会在学校中亦很有地位。学校的气象为之一新。我感受到了这股革命的气息，但我当时还只有 13 岁，很贪玩，又是走读生，晚间的校内的会议一般都不参加，对革命活动的情况知之不多。

1927 年 5 月 21 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围攻省工会、农民协会等组织，屠杀革命群众。受白色恐怖的影响，学校中一些高年级的进步学生逃亡了，进步书刊转入地下。学校为反动分子控制，语文教师改教古文和古诗词。在这种情况下，我为国民革命的中途夭折而忧虑，又不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在以后的两年中，我一直是关门读书，读的是小说之类的书籍，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1929 年中学毕业后，我与一批同学去武昌报考大学，考取了武汉大学的预科。武汉自 1927 年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一直处于白色恐怖之中。这时武汉大学为带有买办性的知识分子现代评论派所控制。学校的课程是复古的、封建的、奴化的。任教的教授亦是保守的、超政治的。

我们这些文科的学生一天到晚就是读古书。每人一个砚池，一支朱笔，圈圈点点、哼哼唧唧。在这个时期里攻读了不少古书，如《书经》、《左传》、《易经》、《老子》、《庄子》、韩文、杜诗、曾国藩的家书、日记，以及《古文辞类纂》等。受父亲的影响，我也读过一些佛教的经论，其中流行的“唯识宗”的著作看得比较多，如《百法明门论》、《唯识三十颂》、《成唯识论述记》等。

我对哲学也很有兴趣。当时,我国的哲学还很幼稚,但处于一个发展时期,国外的各种哲学流派都介绍到中国,有的有译本,有的只有原文版。我阅读过一些唯心主义的著作,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休谟的《人性论》,以及罗素的哲学著作。

这个时期的思想是非常混乱的,既有中国古代的又有现代西洋的,各种思想都混杂在一起,消极的思想比较多。休谟的怀疑哲学和人道主义思想,对我有着较大的影响。这既同当时社会形势有关,也是受家庭影响所致。

1931年秋,我正式进入了大学本科,读的是哲学教育系。把哲学和教育两门学科放在一个系里是受美国的影响。在杜威看来哲学和教育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愿意把教育看作塑造人们对于自然和人类的基本理智的和情感的倾向的过程,哲学甚至可以解释为教育的一般理论。”“教育乃是使哲学上的分歧具体化并受到检验的实验室。”在哲学教育系里,既要学习哲学,又要学习教育学。

哲学是我所喜爱的。在大学期间,比较系统地阅读洛克、贝克莱、休谟,直到康德、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老子》、《庄子》和理学家的著作。在教育方面也系统地读了些书,如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盖兹的《教育概论》、坎德尔的《比较教育学》,以及桑戴克、苛勒等行为主义和完形主义的心理学。

我读大学的这段时间,国家是很不平静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人民奋起抗击。1931年有“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1933年抗日

同盟军在张家口抗战。蒋介石政权则消极抗战，积极“围剿”中国共产党。国家、民族处在危亡关头。一些进步学生离开学校去参加革命，或阅读进步书刊寻求革命的真理。这些对我亦有影响作用，促使我阅读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书籍，并参加了一些救亡运动。

现实生活中矛盾并未斩断我的哲学思维。在怀疑论者休谟哲学中有一个中心问题——因果律一直吸引着我，使我钻研黑格尔的哲学书籍。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关于黑格尔《大逻辑》的因果律问题的。

1935年大学毕业，我面临着人生道路的选择。按照家庭的意愿和个人的志趣，确定以学术、学者为人生的目标。最理想的方案是到北京投考研究生院，然后再通过考试，争取公费出国留学。但那年平汉路被大水冲断，无法抵京。不得已，拿了父亲的朋友的介绍信到广东报考学海书院。这个书院是广东军阀陈济棠举办的，由民社党的张君勱任院长。张君勱在当时学术界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是20年代科学与玄学之争中的一方主将，反对“科学万能”，主张研究形而上学（玄学），在政治上则属于民社党。我进的是哲学科，每月可得一些津贴。入学时，我申明要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和中国古代辩证法，得到了张君勱的赏识。在书院里，我看了一些黑格尔的著作，罗素与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宁静的书斋生活不久为抗日救亡运动所打破。1935年，“一二·九”救亡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我们在广州的一些同学，也组织了救亡的团体，开展活动，又于1936年下半年经武汉，到当时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上海，

参加了一些救亡活动。

1937年2月，怀着当学者的追求，我到了北京，在北京图书馆旁边租了一间房子，每日到图书馆看书，准备参加研究生院的招生考试。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得到了一笔留学的经费，可以到欧洲留学。得到消息以后，我忙着做各种出国的准备了。

我是1937年9月出国的。在国外约两年，大约一年在英国，一年在法国。

在伦敦的时间不长，大约是两个多月。一面补习会话和写作，一面在伦敦大学听点课。圣诞节以后，转入著名的剑桥大学，专攻哲学，听穆尔教授与布罗德教授的课。他们是著名的哲学大师，但都把哲学问题看作纯粹的逻辑问题，在课堂上无休止地进行着哲学命题的逻辑分析。脱离实际的烦琐分析使我厌倦。

在这期间，参加过英国左派书社的活动，阅读《劳动月刊》、《工人日报》等左派书刊。还经常参加一些英国共产党的集会，阅读了汇集马、恩、列、斯著作的《马克思主义手册》。这些活动、学习，使我逐步懂得了什么是唯物论、辩证法，什么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

1938年暑期，我转学到法国的巴黎大学。转学的原因，除了不喜欢英国的学风外，还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在得不到继续资助的情况下，我希望在学费和生活费比较便宜的法国用一年的时间取得学位，拟研究的课题是中国古代的辩证法。为达此目标，在十分节约、艰苦的条件下，埋头读书。

在法国，也参加过法国共产党的集会，阅读法共的机关报《工人报》。当时欧洲正在形成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即人民阵线。我亦曾参加过一些这方面的活动。到1939年暑假，留学经费已近用完。我和同伴又到德国去作短期考察，既学习德语会话，又参观了几所中小学和劳动营。这时，德国和法国开战了。我们乘上最后的列车返回巴黎，接着就回国了。这样也就结束了一生的求学阶段。

解放前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在旧中国，求职之路是很艰辛的。早在我回国之前，家里就在通过各种关系为我求职，终于在西北大学谋得一个副教授的职位。1939年年底到家，1940年就到陕西城固去就职。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以及在西北大学所接触到的，都和我在国外的想象不一样。前方在抗战，后方理应精神振奋、工作紧张。事实不然，到处是文恬武嬉，歌舞升平，发国难财的倒不少。人们关心的是做生意、发财，很少有人谈抗战。学校为反动分子所控制，进步分子被清洗，校内实行反动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讲课只能避开政治，更不可能去讲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我在那里教哲学史，只能照法国学者的讲义讲课。在西北大学，我教了半年。

1941年夏，回到湖南，经朋友介绍进了设在兰田的国立师范学院，任教授。这所学校有不少有名的教授，但社会风气同西北大学相似，大都不关心国事，而吃喝风很盛。学

校是国民党的 CC 派头目陈立夫办的，没有自由精神，文科教师趋于保守，不关心政治。环境逼迫我对政治采取缄默态度，教学也得避开敏感问题。当时，我教哲学概论没有恰当的教科书，于是我把哲学概论的内容改为科学概论，大讲自然科学。作为依据的是两本书，一本是英国霍格本的《为公民服务的科学》，另一本是爱因斯坦与莫斐尔合著的《物理学的进化》。前者讲自然科学发展的社会背景，后者讲物理学基本概念的发展。虽然我是如此的谨慎小心，但到 1943 年还是被学校解聘了。事后听说学校是按照教育部的命令将我解聘的。由此可见，在旧中国教学之难。

被解聘后，我回到醴陵，在开明中学教了一年英文。此后，又在攸县临时中学教了一年英文，直到 1946 年春。这是我一生中最可宝贵的中学教学实践。

当时，农村中学教师的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工资是按谷计算的，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但是，思想上是十分苦闷的，除了被解聘的因素外，更多的是对社会前途的担忧。在农村里，处处可见的是国民党的腐败。国民党军队对日军胆小如鼠，而对老百姓则作威作福，百般蹂躏。保长、乡长及县以上的官吏敲诈勒索，贪污腐化。通货膨胀，百业凋零，经济破产，民不聊生。在农村里，政治消息又是很闭塞。我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已在敌后发展了广大的解放区，也不知道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胜利，更不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我不能不为中国的前途担忧。

1946 年在我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抗战胜利

后，一些朋友从重庆回到了上海。有人写信来要我到上海去，在那里谋求发展。大约4月间离开长沙，5月到上海，寄居在一个朋友家里。同住的有中共地下党员蔡仪，也有属于民主党派如民盟的何思贤。我跟着他们跑，同许多人有了接触，如搞哲学的杜守素、赵纪彬，搞国际问题的石嘯冲、梁纯夫、陈原，搞文学的杨晦，编刊物的夏康农等，也去看望过民社党的张君勱、民盟的张东荪等人，经常接触的还有中共在上海的发言人陈家康。在上海，接触的人多，看到的报纸和刊物也多，在报刊上经常有政治的争论。这一切都和我在醴陵、攸县时的一潭死水的生活大不相同。沸腾的生活，尖锐的矛盾放在面前，逼迫着我思索，要我通过重新学习，作出自己的回答。是年11月，我通过介绍进入暨南大学任教，教哲学概论和教育哲学。在暨南大学两种势力的斗争很激烈，反动校长控制学校，而中共地下党则领导师生参加民主运动。在党组织的引导下，1946年我参加了大教联。同时，尽力宣传人民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概论里，把共产主义哲学作为一个重要的派别来讲授。在教育哲学课，以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为课本，讲授时对它进行分析、批判。

从1946年到1949年，是我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著作和党中央的文件，并清理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重要阶段。其思考结果陆续写成文字，公布于众，主要内容如下：

在政治方面，首先是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特别是对美国文化侵略的认识。美国特别注意在华的文化活动，

而且扬言“我们对中国的关切不是经济的，而是父亲对子女的那种关切”，并以主张门户开放和退还庚子赔款为例证。我在参加过几次座谈会以后，对美国对华文化政策有了一定的认识，就写了《美国对华文化政策的政治经济意义》一文。文中列举史实证明“美国之侵略中国与其他列强同样积极”。至于“门户开放”政策是在特殊条件下提出的。在列强瓜分中国的时候，“美国有南北战争，以及西部之开发，无力顾及远东。”到19世纪末，美国重新经营远东时，“中国已由其他列强瓜分了势力范围”，“于是才在1899年提倡门户开放主义，以备打入其他列强的势力范围中去。而且由于自己后来了一步，不得不另辟蹊径，由文化活动入手。”美国对华文化政策取得什么效果呢？文中列举了几个方面：一是帮助了美国工商利益的发展；二是帮助打击日本在华的势力；三是帮助了美国的独立经营中国，特别是一批留美学生进入政府，成了中美“行政合作的核心”，一些留美学生成了买办，还笼络一批在野的知识分子。本文最后指出：“由于美国政策实质的暴露，它的欺骗作用减少了。”

其次是“自由主义”、“第三条道路”问题。当时，国内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具有“自由主义”的倾向（也就是旧民主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倾向），向往美国式的民主，强调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作用，主张用“理智的”方法解决问题，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在蒋介石的法西斯专政和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之间另走“第三条道路”，走“中间道路”。像张东荪等人都持这种观点。

提倡“自由主义”也是一种国际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的资产阶级一方面要和德、意、日法西斯势力作战，另一方面又反对苏联的日益增长的影响以及本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倾向，也强调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优越性。美国的杜威写文章鼓吹“民主”，罗素在战后也公开反苏。杜威和罗素曾到中国来作过长期讲学，在中国学术界有影响。

“自由主义”、“第三条道路”自然为中国共产党及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所反对。因此，提倡自由主义和反自由主义，走第三条道路还是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经常成为知识分子中的争论问题。就我原有的思想倾向来说，是比较倾向自由主义，是很赞成杜威和罗素的学说的。在争论中，我必须弄清楚自由主义的实质及其理论根源，以及第三条路线的错误。由倾向自由主义到反对自由主义，可以说是我个人政治思想、学术观点的转变和自我批评。

围绕着反对自由主义我写了三篇文章。一篇是《张东荪先生的思想》。张东荪在中国学术界是很有地位的，试图综合东西方的哲学建立中国哲学的体系，政治上则主张走第三条道路。我与他还有些私人交往。我读了他的三本著作（《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和《理性与民主》）之后，深感他的思想是错误的。文中指出张的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是有很大差别的，他所主张的和平改革、阶级协调在阶级社会中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社会发展中知识分子不可能成为中坚分子，张所理想化的“士”实际上是那些讲儒家思